

对话百家



WRITERS' STUDIO

青年报社
陈仓 李清川 编

执行主编
王主编



精神胎记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精神胎记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陈李清川
青年报社
仓

执行主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胎记 / 青年报社编 ; 李清川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5
(对话百家)

ISBN 978-7-5500-3251-4

I. ①精… II. ①青… ②李…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6553号

精神胎记

青年报社 编 李清川 主编 陈 仓 执行主编

出版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蔡央扬 郝玮刚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251-4
定 价	6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1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给你一束光

光能繁殖

李清川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酝酿在《青年报》新创一份文化类子刊，是在2016年春节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说“论证”是不准确的，其实无需“论证”现实境遇都是尴尬的：在那个冬天，纸媒没落成了大众话题，文学式微也常见诸讨论，此时抱残守缺，以纸为阵地、以文学立足，我们似乎是在逆流而上。但是我们宁愿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势而下，因为在理性思考中我们发现，在文化多元和节奏趋快的大时代，青年更加需要定律与方向；在个人梦被自由放大的际遇下，青年比任何一个人群更加需要文化的力量。

2016年4月，《青年报》迎来第一万期出版，我们将《新青年》周刊正式落纸。之所以选择“新青年”为名，我们并无攀附之意，我们“新青年”的“新”，是思想的新，也是文化的新；我们“新青年”的“青年”，不仅是意欲照射到的目标，也是力求寻找的光源。如何赋予这份子刊以魂呢？我们认为，关键是要有眼光。我们这样比喻，文学家、文化学者、文脉传承和弘扬者，就是灵魂的塑造家。因此，我们以他们的最新作品为主线，开设《上海访谈》《自白》《重读》《旁评》等栏目，约请青年写作者进行同题创作。在文人、文章、文脉、文鉴这一

逻辑下，我们致力捕捉那些既可以沉淀为历史的，又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视点，关注那些不是流行的，不是潮头的，但一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有力量的，有灵性的，是年轻人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相遇的。我们想做的，就是给你一束光，让它照着赶路者的某个方向。

到《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启动编辑工作时，《新青年》周刊已经出版了133期，不觉中，我们用心陪伴了三年时光。在岁月长河中，这光景不过只是个瞬间，但如果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一瞬之中的永恒——要是以130多位作家为坐标点编绘一张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不是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学的当下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不是能触摸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某些趋势？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有更多、更深广、更具代表、更有期望空间的作家加入，这一文学地理的建构还在继续。

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而这无疑来自作家和读者。

平素里我们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更多是在文字中相见，这种由文字及情感的共振，不免伴生仰视和忐忑。是作家们的宽容、诚恳和磊落，让我们始终温暖。联系贾平凹时，他正在武汉授课，身体很疲惫，但得知我们“等米下锅”，他在凌晨配合完成了采访。同样的情境下，迟子建在忙于家事，阿来在藏区调查，王跃文在基层参加活动，李佩甫在创作新作……我们的高频访问从未陷入“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的不安，真是个奇迹。

每当周五收到陈仓发来的清样，我都会想，每一位作家执着的文学故事和丰富的人生体验，都无异于一支支拧开的手电，在他们的言谈间，光就会自然发散出来。张炜在谈到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创作时说，如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为此，他耗时二十二

年，写下450万字，流了很多眼泪。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经历了十七次退稿，他并没有因为挫败而迟疑，还将其解读为“每一次退稿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打击，对作品来说都是‘打铁’”。以平朴为人和谦逊姿态为人称道的陈忠实，在生前接受采访时常会强调，他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而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

另一方面，读者始终是我们关注和连接的重点，是我们的情愫所系，源源不断给我们以持久力量。在社交网络活跃的当下，他们用传统的书信和电话，表达着对作家、作品和《新青年》周刊的偏爱。他们中，有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媒体同仁，更多的还是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他们中有人要跨年度、跨地区订阅报纸，有人想购买全套报纸收藏，还有人，只为说一句“我喜欢”。“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如此鼓励下，我们既欢喜在心，又感重任压肩。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事实上，我们编辑出版《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还有为中国文学保存温暖历史的一点野心。客观说来，受出版形态、地域限制和传播时效影响，对话类文本的阅读体验还需优化和释放。我们希望，通过必要的梳理整理，去满足部分读者深入阅读的需要，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这种利用纸媒积攒“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我们知道，出好一套书，出一套好书，并不比办报简单，恐怕还会复杂一些。《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我们要向每一位作家致谢，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团队，他们倾注了热情和心血。春节前，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团队专程来到上海，我们有过倾心一晤，他们对内容修订、装帧设计、市场推

广提出了高水平意见，做了细致安排。我们都相信，有文学相伴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被文学注入的时代是有灵魂的时代。这样的共识是幸福的，既有各自职业的坚守，也有来自文化的传承。

最后还要做几点说明：一是每卷本目录中的作家次序，大致遵从了姓氏笔画排序。姓氏传自祖先，即便是笔名也代表着文字的血统，所以是天赐的，是自然的，自然的方法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因此呈现出老幼相携、结队出发的友好气象。二是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信息，依据了报纸首发的资料，没有进行全面更新，因为作家一直都在路上，很难等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三是从报纸到图书的形态转化中，出于平衡新闻性与文学性，兼顾传播功能和阅读体验，去除了随时间推移而失去效力的部分内容。以上处理，如有不妥或者疏漏，还请予以理解和谅解。由于能力和目力所限，不免会有遗憾和失误，也希望得到各个方面的谅解。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以此致敬历史。遥想百年前的《新青年》杂志，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明亮的符号。

历史的门槛都连接着新起点。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以此送给《青年报》和她的读者。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愿由此开端的新的路上，我们总有希望，充满发现。

（作者系青年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文学属于青年

陈思和

1917年，陈独秀携带着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移师北京，在北京大学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学革命”。是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运动承载着思想革命的使命，席卷全中国。两年以后，1919年，《新青年》的思想启蒙直接唤醒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应对巴黎和会的外交事件，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中国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之初，仅仅是一个励志型的青年思想杂志。北上以后，短短几年就办得风生水起，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什么原因？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原因，那是全国优秀青年云集之地；提倡“文学革命”是第二个原因，新文学以其新鲜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深深吸引了大学里的青年学子。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相结合，便可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革命先锋的影响。我曾经把新文学运动领袖们的出生年份列出来：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80后；胡适出生于1891

年，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属于90后；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也就是70后的“尾巴”，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里几乎没有50后的作家。康有为生于1858年，严复生于1854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

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青年的时代。

上面这段议论，是我在读李清川、陈仓主持编辑的《对话百家》系列丛书书稿时，由衷想说的话。他们两位都是有文学情怀的媒体人。我与陈仓相识于复旦大学的课堂里，他来约我做一个访谈。他告诉我，青年报社创办了一个《新青年》周刊，每期用七八个版面来介绍一个当代重要作家，那时已经推出的就有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刘醒龙、欧阳江河、周大新、李佩甫等等，向青年读者展示当代文学的风貌。我被他们的编辑理想深深触动，我知道《青年报》是一家面向青年人的资深媒体，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由它来隆重推介当代文学，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更替的关键时期。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我的意思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学，原来就其本质而言是青年文学，它含有强烈的文学先锋因素，表达了中国青年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绪和审美形态。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更形象一些说，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年”阶段。其标志之一，对照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今在文坛一线创作的活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作家群体，依然是1950、1960年代生人，他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与写作风格，艺术上也日臻完善，他们是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代作家，但他

们毕竟已经不是青年了。而真正反映着大多数青年社会情绪的文学，却被遮蔽在资本渗透下的网络新媒体、文化市场、大众娱乐等尘霾之中，还没有发出真正的光彩。我把这种文学状态称之为“中年危机”。

因此，如何弥合这两大类文学的健康因素，有效地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结合起来，推动新一代的五四精神传人的诞生，把新文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延续下去，让更多的文学青年了解和认同前辈作家的创作心声和生活态度，在新形势、新环境、新媒体中凝聚起新的力量。这对我们所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也是光荣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青年报社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周刊，自觉运用大众媒体来向青年读者推介当代著名作家的工作，充满敬意。他们选择的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弘扬他们卓越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总结他们在文学上的精神血脉，扩大他们的创作影响，对于传承新文学传统的血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只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风车大战，但终究是“石在，火种就不会灭”，人文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现在青年报社把《新青年》周刊上的130余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录编辑成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套六卷本的书能够获得更多的青年读者的喜爱。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 | | | |
|-----|-----|-----------------|
| 001 | 弋 舟 | 作家可以为神代言 |
| 015 | 马金莲 | 我的财富是苦难中的温暖 |
| 029 | 双雪涛 | 东北风大有雪无法成就我 |
| 043 | 文 珍 | 我不希望仅仅被界定成“女作家” |
| 057 | 王十月 | 打工是我的精神胎记不容回避 |
| 071 | 王威廉 | 逆时针去成长生命才会丰富 |
| 085 | 付秀莹 | 我愿用中国审美写中国心事 |
| 099 | 田 耳 | 现实的茧太厚要想破出越来越难 |
| 113 | 石一枫 | 我反感不把自己当凡人 |
| 127 | 乔 叶 | 不提供简单的幸福 |

- 141 孙 频 伤痕是用来照亮自己前方的微光
- 155 朱山坡 空中加油能延长飞翔的距离
- 169 张悦然 艺术创造能把人解救出来
- 181 张 楚 普通人的光照亮我的眼睛
- 195 李 浩 让百年后的人读出会心
- 209 李骏虎 无论身处何时都要去追问
- 223 肖江虹 文学最终目的不是对抗
- 235 周李立 关注人就好不用强调是男是女
- 249 郑小驴 真正有力量的东西在血液中
- 263 徐则臣 我愿意把女性写得很善良
- 275 黄咏梅 我喜欢写小人物高出地面的理想追求
- 289 鲁 敏 我负责把暗疾撕开不负责解说

弋 舟



弋舟，1972年生，江苏无锡人。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蝌蚪》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我们的底牌》等八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鲁彦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

作家可以为神代言

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弋舟说这是一件迷人的事。文学能够让他在一饭一蔬，睡去与醒来，这些充斥着我们生命的事情上获得自由。他安心于前往语词的秘林深处，并时刻警醒自己不忘思考，不草率，不挥霍自己的才华。在讲述故事时既重视审美，又追求智慧。他说，一个小说家，在不惮于以恶想象这个世界之外，还应当对于这个世界葆有一份暖意，这也关乎小说家的教养。

我们还是循例先来回望一下你的所来之路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在今天，选择成为一个作家往往意味着以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你来说，这种生活最为迷人的是什么？

德南好，这样的话题所谈非少，但能与谈得来的朋友一起聊聊，从来都是愉快的。我将自己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起点算在2000年。一方面，新世纪伊始，这个年份，多少会给自己一些“万象更新”的心理暗示和激励，仿佛自己由此便开始了新的历程；另一方面，1999年我写出了《跛足之年》，这部长篇对于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它在某种程度上指认了我所面对的世界，由此，“三观正确”，我觉得我可以去踏实书写了。重要的还在于，从此以后，我自认自己写作时的感受，开始脱离

了先前的那种“业余”状态，进入到一种更加自觉和清晰的阶段，我将之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以此来区别那种即兴的、业余的、文艺青年式的写作。

当然，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就是在说我从此以“作家”这个身份来认同自己，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和“专业”。我这里所说的“业余”和“专业”，肯定不是指那种约定俗成的职业区别，而是指一种内在的、具有严格分野的写作状态。我觉得，选择成为一个作家，非但今天，昨天乃至明天，可能都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确立。这也正是我向你强调“专业”的原因——它成为了你的生活，当然需要一份严苛的确认。以此为生活方式，痛苦与幸福并举，但我并不想格外夸大这种生活与其他生活的不同，我觉得，本质上讲，在有限的生命里，“怎么活”，无论如何，都大不过“必须活”。于是，现在让我来归纳这种生活的迷人之处，我的第一反应即是——它使我可以睡到自然醒。不是吗，一饭一蔬，睡去与醒来，正是这些事物充斥着我们的生命，在这些事情上获得自由，怎么会不迷人呢？

你说的我非常认同。在我个人看来，以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首先是精神上的，包括读与写这两个层面，并且跟一个人的心性有关系。心性决定了这样的精神需要。也许有的人平时特别忙，可是在忙碌过后，不读读文学作品，总会觉得不快乐。写作亦同样如此。写作的生活就像你所说的，是“痛苦与幸福并举”。写小说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从现代以来，许多小说家都有一种共识，要着力揭露世界与人心之恶。这一方面跟世界的局势有关系，一战与二战的发生，让许多人对人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与不信任。写作不再是着力于塑造自由意志与生命意志昂扬的主体，而是必须往深渊里走，要“揭出痛苦”，要写人的非理性的、幽暗